#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

## 说　明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是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的印证和补充，是为从事党史教学和军史研究的同志提供参考而编辑出版的。

红二十五军的历史文献、资料较多，本书只是有选择地进行了编辑。所选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属首次公开发表。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文献。主要选自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鄂豫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历史文件，并同中央档案馆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档案馆编辑的《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刊印的原文有关部分和从中央档案馆复印的部分原件作了对照。第二部分为回忆史料。主要选自红二十五军老同志撰写的文章和一九六〇年、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八 年三次编写修改《红二十五军战史》时的调查、访问、座谈等资料。第三部分为参考资料。主要选自敌伪档案材料，包括军事战报、电报等。第四部分为编写资料。主要是三次编写修改《红二十五军战史》时的有关批示、信件、会议纪要、报告及几篇专题书信、意见。许多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和研究红二十五军历史的专家学者，曾撰写了多部（篇）回忆录、人物传记及专题史料、文章，这些，除少量收入本书外，一些有关的书目、文章，另附一目录索引，以备查阅。

本书辑收的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文献部分各件的标题、副题，凡由编者加拟或修改的，加*号标明；参考资料部分各件的标题，均为编者所拟。有关红二十五军长征时期的内容，编者作了重点编排。本书的编辑工作遵循尽量保持资料原貌的原则。对错别字，将正字加于其后，用[]号表示；对漏字，加字，用[]号表示；对衍字，用□号框起；对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者，用×号代替；对缺损字，用□号代替。需加以说明的，尽量作了注释。由于所选资料大部距今时日较远，加之我们水平有限，在编辑、考证方面难免有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　北京

# 第一部分历史文献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关于反国民党四次“围剿”下的总任务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四次包围会剿，虽用尽了残酷的手段对苏区秋收、〈秋〉耕、粮食、耕牛和群众物质生活进行了严重的破坏，然而这种破坏不但不能消灭苏区，并且更加激动[起] 了群众的怨怒[恨] 与革命的团结。由于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党的不可挽救的死亡命运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斗争，世界帝国主义所组织的国民党第四次包围会剿，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中央苏区及其他各大苏区，都因为国民党集中了主力到鄂豫皖苏区，所以都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开展。在鄂豫皖苏区两个多月以来，红军的不断的胜利与游击战争大规模开展，已经使国民党遭受严重打击，他的主力军队损失过半，而且全国的红军大胜利，全国革命运动到处开展高涨，与军阀问的互相战争的局势部开展，已经更加大大的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力量，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国民党第四次包围会剿已经走人[向] 失败的地位。

二、在这种客观条件下，鄂豫皖苏区红军胜利扩大，全苏区游击战争的胜利，尤其是鄂东北苏区的游击战争，已经有了伟大成功。国民党对于苏区群众改良欺骗完全破产，被压迫扯白旗的少数群众重获逃回到赤区来和坚决向反动作斗争。农村中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起来，在反“包剿”的斗争中已经站在胜利中不能失败的地位。但是目前国民党的主力还未完全消灭，而苏区与红军反“包剿”的胜利，虽然暂时激起了局部的军阀战争，必然终于要促进在死亡之恐怖前面的地主资产阶级各派互相团结，所以扩大会认为目前我们的反“包剿”的斗争，依然是在紧张的关头，必须越打越有劲，经过残酷的斗争，然后才能够争取冲破第四次“包剿”的完全胜利。

三、根据这种形势，我们当前的中心政治任务就是改造共产党、青年团、苏维埃与一切群众组织，训练广大工农群众，来作长期内战争的准备，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继续培[扩] 大红军，扩大游击战争。从游击战争中锻练[锻炼] 出新的红军主力，开展土地革命与反帝运动，消灭内部的敌人，夺回中心城市，迅速的与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的苏区的游击战争运动打成一片，加强对于豫东南与皖西北苏区的游击战争的领导，打破苏区内游击战争的不平衡的状态，来恢复整个鄂豫皖苏区，同时要向外发展扩大游击区，使苏维埃革命潮流日益普遍到新的区域去，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造成战胜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

四、要完成当前中心任务，我们必须要做以下的工作：

（一）红军主力要在巩固苏区的策略下面与敌人作运动战，来各个击破国民党匪军主力，红军须加强内部党的建设与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去扩大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和锻练[炼] 红军本身成为铁的红军。

（二）用全党力量去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改善红军家属生活，准备红军作战的一切军需粮食和加紧适应军事需要的各种物质。

（三）扩大与整理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武装组织，实行完善的农村戒严制度，建立退伍红色战士协会，改善伤病及医院工作，实现武装全体工农，同时迅速形成各游击区的独立师。

（四）整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经常工作，建立宣传工作，建立秘密工作系统，改造巡视制度，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工作要把改造支部工作为中心，

尤其要改造首先健全武装队伍中的党的领导及支部工作。

（五）厉行全体党员军事化，施行普遍的党内军事训练，特别提高一般干部的军事知识。

（六）加强党内的军事共产主义的教育，提高一般党员的文化政治水平，和培养大批的工作干部。

（七）反对对青年工作的取消主义倾向，改造青年团的工作，厉行全体青年团员军事化，发展青年与儿童的文化政治军事教育，健全少先队的工作，建立青年团与青年群众的健全领导与青年团的独立工作，使青年团成为革命的国内战争中一个有力的指挥。

（八）改造苏维埃，反对官僚主义，剔除国民党的统治方式的残余，养成苏维埃的工作干部，建立苏维埃威信，实行土地劳动及一切法令政策，改造苏维埃的各部门工作，使之适合战争的环境与需要和使苏维埃成为国内战争的领导者。

（九）健全工会、贫农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他们的独立工作，和他们一切工作联系到反“包剿”的战争，特别要加强执行劳动保护法与改善工会工作，建立对跑反到白区和插白旗的群众的正确态度，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去争取这些群众，建立这些群众中的组织。

（十）加紧肃反。改造政治保卫局的工作。

（十一）游击战争要密切联系到保障农村生产与工农切身利益。

（十二）扩大反帝国主义宣传，健全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反对军阀混战，揭破国民党的卖国原因。

（十三）加强对白色士兵的宣传工作，发展白色军队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秘密组织。

（十四）改造特务队和界边游击队的工作，扩大游击到白区去，为自区群众切身利益与最后解放斗争，反对保甲制度，组织白区群众，造成苏区四周广大的游击区。

（十五）建立京汉路和汉口、武昌等中心产业城市的工人运动。

（十六）扩大赤区内互济会工作，对于跑反群众、对粮食困难区域的群众要实行互济，加强互济会工作的领导。

省委扩大会批准省委常委会通告一〇一号中所有关于目前各项具体工作的决定，并号召全体党员来执行。

五、扩大会认为敌人给予苏区物质上的破坏与苏区内各方面干部缺乏，我们的困难是很大的，但是整个的政治形势和反包围会剿斗争的经验证明能够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必须用很大的教育精神来培养一般干部，提高一般党员与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必须来坚决发展两条战线上斗争来克服党内由于各种客观困难所引起的动摇。我们要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崩溃估计不足，忽视群众力量，不[相]信群众，怀疑反“包剿”的出路和一切对革命战争的畏缩妥协，对实际工作怠工消极等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同时要严厉反对一切忽视“包剿”的“左”倾空论和借“左”倾的话去掩盖对实际工作的消极，我们必须用极大的教育说服与斗争来消灭党内国民党思想与领导方式的残余，来实现党内布尔什维克化，才能够领导群众冲破第四次包围会剿，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中共鄂豫皖省委临时紧急会议决议案*——关于目前形势和反四次“围剿”的任务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通过）

一、最近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证明了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对于整个革命运动前途和鄂豫皖苏区反“包剿”斗争前途的估计的正确。

一九三二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恐慌的继续深入与明白的暴露出这个经济恐慌的没有出路的状况，已经使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第三时期发展到接近一个转变点。普遍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恐慌；环绕在东三省问题的周围的帝国主义列强间一切冲突矛盾的加紧；与英日联合对美的形势的中日渐形成；战债问题与裁军问题的陷入僵局，这一切都明白的表示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已经迫在目前。另一方面，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功；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执行；苏联对波兰、对法国、对中国的互不侵犯条约的订立；南京政府与苏联外交关系的恢复，都表示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巩固与国际地位的增进。加以今年世界失业工人运动节的伟大成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大规模破产、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渐渐到处形成严重的骚动，与中国苏区红军反第四次“包剿”’的胜利，证明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在各个最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迅速走向成熟。同时，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的这种极端动摇和没有出路的地位，帝国主义列强间大战危机的紧迫，国际的反动的法西斯蒂运动的急进，与阶级矛盾的极端尖锐化，更无限的加强了帝国主义世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苏联的仇恨。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的战争危险，就是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更加极端的紧张起来。

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是由于最近国际联盟的瓜分中国的企图明白暴露，与苏联的同情于中国民族解放这些事实的压迫之下，国民党所采取的一种外交政策。我们应当庆祝苏联的外交胜利。同时要指出，国民党南京政府自从十六年[1]因为广州暴动的发生与苏联“绝交”以来五年之久，现在又因为依赖国际联盟这个政策的卖国性质完全暴露，国民经济的更加破产，英日联合对美的形势日渐形成，然后才来对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并且一面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一面赶快声明“恢复邦交与联俄容共绝非一事”和“剿共行动继续进行”，是明显的表示国民党的这个外交政策绝不是对于苏联或中国的革命运动有了什么让 步，恰恰相反，是美帝国主义所指示的一种阴谋策略来一方面欺骗中国民众，掩盖他自己的卖国政府的面目，在民众中散布“国民党还能够反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去挽救他垂危的生命。和另一方面企图牵引苏联到中日关系的国际纠纷中去，造成用日<本>帝国主义做先锋来开始武装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鄂豫皖苏区共产党的对这个问题的任务，是向全体民众指出这种阴谋，加紧反“包剿”的斗争；加紧反对国民党的卖国与进攻苏联的企图；加紧准备和帝国主义作战；武装拥护苏联。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恐慌下面，一九三二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崩溃，已经进一步采取了更严重的形势。工业中最后残留一息的纺织工业已经陷入破产地位。农村中一部分是水旱、天灾，另一部分是丰年，形成了“生产过剩”，又使农民大批破产。在统治阶级，一方面财政的完全破产，局部的军阀战争的不断爆发，与一般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第四次“包剿”的陷入失败地位与主力军的大部丧失，和全国工农革命高潮的猛烈发展，使整个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政权立即有死亡的危险。站在这种地位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蒋介石的计划是更加紧的投在帝国主义的怀抱里面，向帝国主义列强大借外债，用出卖全中国为条件（美国的十万万盎斯金银借款和美麦借款）继续向其他各派军阀（主要是向北方军阀）妥协，企图造成反对工农革命的各派反动势力联合战线。加紧武装民团，强迫实行保甲制度，加强采用各种法西斯蒂式的暴行与欺骗宣传，尤其是在城市中加紧利用青红帮、流氓、工贼的破坏罢工运动与工人组织，强制实行反动的工厂法与强迫仲裁，极端加强对于工农群众的捐税剥削，和对于苏区群众的公开掠夺群众财产与破坏生产，在这一般的策略之下，他搜集残余的主力军队去对付中央苏区，他企图用这种绝望的斗争去延长中国反动统治的命运，但这种企图是不会有结果的。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下的中国，国民经济总崩溃过程固然绝对不容许实现任何改良主义的政策，同时，空前猛烈的大众破产与贫穷化的过程，正在异常迅速的推动着全国工农群众革命化的过程。在这种条件下，甚至革命中的局部的错误都不能阻止革命的胜利的开展。中央苏区红军的扩大了闽北苏区，同赣东北苏区打成一片和发展到安徽南部，打大城市与威逼南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到陕西与中国北方苏维埃运动的急速开展，上海、天津各大中心工业城市无产阶级罢工运动的猛烈开展与从反攻进到进攻，全国农村到处纷起的农<民>抗捐、抗租运动，鄂豫皖苏区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与新主力红军的形成，已经使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疲于应付。如果蒋介石用他几乎全部的主力来进攻鄂豫皖苏区，结果还是遭受了这样的损失，那么现在在江西中央苏区红军胜利进攻之下，搜集他的残余主力去对付中央苏区，蒋介石一定不免遭受最后的惨败。反对第四次“包剿”的斗争正在从反攻转到进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已经成熟，完全冲破第四次“包剿”，推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准备夺取全国政权，已经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同时，目前的国际形势更加证明中央所指示的“冲破第四次‘包剿’的结果，将使中国革命直接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这指示的正确。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已经是目前最迫切的行动任务。

二、这种客观形势必然要造成对于鄂豫皖苏区的反“包剿”<斗>争更为顺利的条件。鄂豫皖苏区的游击战争，自从红四方面军行动到西北去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胜利。主要的是鄂东北苏区方面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赤南[2] 游击战争的开展，光山苏区[3] 的恢复，商光路线[4]上工作的开展，游击武装的扩大，红军主力的形成，与大小许多战争与游击战争的胜利，和群众革命情绪的热烈，已经证明鄂豫皖苏区依靠现在的力量做基础，已经可以巩固起来，完成冲破第四次“包剿”的任务。现在由于蒋介石开始集中他的残余主力去对付中央苏区，收人把八十师调往赤城[5]，七<十>五、七<十>六帅调往北方，对于“包剿”苏区的反动军队和力量上一定会减弱。当然，国民党统治在目前一定还不得就放松这个苏区，他们最近所决定的“驻剿”、“进剿”计划一定还要有相当的布置作残酷的斗争。然而，在我们坚决加紧反“包剿”斗争，和反动统治的地位的继续恶化，全国革命势力猛烈开展之下，我们将一天天更转到优势。所以我们现在的根本策略，应当是立即抓住这个时机转向积极的反攻。首先，立即加紧的执行省委第一次扩大会决议案中所指出的“使鄂东北与豫东南、皖西北苏区游击运动打成一片”的任务……，我们要迅速打退[通]商光路线和商麻路线[6]，立即集中起独立第六师来，迅速成立鄂东北的第二个独立师，加紧打击苏区内的匪军，消灭民团，肃清反动。保护群众粮食、物质[资]与冬耕，相机争回中心城镇，并扩

大游击运动的范围，深入到赤区四周的白区，抄到“包剿”苏区的匪军后面去，扩大游击，造成苏区四周广大的游击区和开展土地革命的影响到远远的白区中心去。为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加紧执行省委第一次扩大会决议中所指出的扩大红军，锻炼红军主力，武装全体工农，整理与扩大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加强党的工作，改造支部工作，改造青年团工作，加强党员军事化，提高党内共产主义的政治教育，改造苏维埃及一切群众团体的工作，加紧肃反，扩大反帝宣传与反帝群众组织，加强白色士兵工作、白区工作、边界工作与插白旗的群众工作，与扩大互济会工作等等。和严格执行省委一〇三号通告“关于改造党的军事工作”’所指出的组织党员后备军，建立党的军事部与加强各级党部对于军事工作的领导等等工作。必须立即加紧退伍红色战士协会的组织，组织跑反群众和对于从匪军中脱险回来及受匪军胁迫欺骗份<分>子的招待与教育工作（设立招待处）。省委临时紧急会议特别指出，在执行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中，最弱的部分就是白区工作、白色士兵工作与反帝工作。在目前正要扩大游击范围与加紧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的时候，对于这些重要工作的忽视是再不能容许的了，会议提起全党的注意，彻底转变这些工作。

三、当然，我们的斗争不是没有困难的。有些同志们看到了斗争中的许多困难，却总看不见我们可以战胜困难的一些条件。这些困难主要的有二个。首先就是匪军破坏苏区粮食、物质[资]与生产，和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所给与<予>苏区群众和队伍的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我们有充分的条件可以战胜这个困难。第一，是加紧领导苏区工农群众的斗争，坚决把游击战争同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加紧领导群众冬耕，改善藏粮食的工作。广大发展群众的互助与确实执行苏维埃政府对于被损害群众的援助，特别是对于红军家属的援助，和实行严格的节省粮食办法。同时，苏区的物质[资]困难必须从扩大游击战争、夺取敌人物质中去求得解决。要尽量发动群众的斗争精神，多组织运输队，不断的向民团、土匪进攻，夺取白区豪绅的粮食和匪军的粮食。对于这样夺回的粮食，宁可全部分给群众，只有在群众自动拥护之下，接受一部分给队伍的给养。群众有饭吃，队伍不怕没有饭吃，这里主要是党、苏维埃对群众的关系问题，和游击战争密切联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我们一定在这里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来解决这些困难问题。粮食、物质[资]的困难，只能引起我们更加积极、勇敢的去向敌人斗争，不是来使我们灰心失望的！第二，干部缺乏的困难。这主要的要由严格实行加强党内政治教育，正确开展党内两条战线斗争与正确执行肃反的阶级路线来解决。党必须承认苏区内这许多干部的叛变、动摇和受欺骗加入反动组织，主要的是由于过去党内政治教育的薄弱。同时，肃反没有充分对受欺骗分子加强教育，去挽救他们的生命与为保存干部，也是目前干部缺乏的一个原因。因此，党目前的干部缺乏状况，只能引起全党来加紧注意每个党员的政治学习，和不放松的对于每个党员和干部的错误的批评与不倦的教育。由于目前干部的缺乏状况，而怀抱着一种对于革命前途的隐优，深恐不能把斗争支持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一种方式。同时，由于目前干部的缺乏而发生执行党的纪律不坚决，对肃反工作不坚决，留恋党内不良分子，是更大的危险。这种迁就、留恋，结果只是替敌人保留在革命队伍中的侦探与敌人，必然要给党和革命以最大的损失。省委临时紧急会议，坚决号召全体党员起来反对这两种不正确倾向，加紧每个党员的学习来解决干部问题。

四、客观的形势是很顺利的，问题只在我们自己。只有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的动摇是最大的危险，我们必须用丝毫不妥协的斗争来克服主要的右倾危险。就是一切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崩溃估计不足，忽视群众力量，不信任群众，怀疑反“包剿”的出路，害怕困难和一切对革命战争的畏缩、妥协，对实际工作的消极怠工等等倾向。同时，要反对一切在比较顺利的客观条件下，忽视“包围”、“会剿”的“左”倾空论和借“左”倾的空谈掩盖对实际工作的消极。党要从政治上去加紧揭破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和取消派的反动面目，并从这种斗争中去教育一般党员和群众，团结工农干部，保持党内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来争取最后的胜利。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十六年，为中华民国十六年，即公元一九二七年。

[2]赤南，即赤南县。当时鄂豫皖苏区新设的一个县。位于商城县南部之麻城、商城、金寨三县边区。

[3]光山苏区，即当时鄂豫皖苏区设的光山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主要合今光山县南部和新县大部。

[4]商光路线，指商城县到光山县的行动路线。

[5] 赤城，即赤城县。当时鄂豫皖苏区将商城县改称赤城县。

[6] 商麻路线，指商城县到麻城县的行动路线。

# 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
## （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中央：

从四次“包剿”以来，我们就和中央失去了连[联]系，但是依照目前鄂豫皖苏区的情形，实有和中央迅速建立关系和得到中央指示的必要。现在首先将苏区情形和我们所采取的策略向中央报告一下：

（一）从去年八月间敌人开始向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以来，红四方面军和敌人在黄安、光山一带一共打了三次大战[仗]，第一次（八月十一日）在黄安，我红十二师及十一师之一部击溃敌第二、第十两师以上兵力，将敌人第六十团完成缴械，此外敌人伤亡共二千以上，我方伤亡约六百余人；第二次是八月十五日，在黄安县七里坪一带，我方用主力四师以上（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击溃敌人五师，打死敌人三千以上，敌人弃械在五六千以上。这仗把敌人全部动摇，当晚敌人各师长开会议都是主张退兵。如果这次敌人一退，我军乘胜继续追击，直可将敌人主力消灭。惜敌方以卫立煌坚持不退，我方亦来[未]坚决追击，所以仅得一大的胜利，未能完全消灭敌人，这次缴敌人械二千以上，我方伤亡约千人。此后红四方面军就退出七里坪，主力北上到光山，意欲用飘忽战略去打击光山北部敌人。适敌以第三、五<十>八、八<十>三共三师人走光山、罗山交界之大山来袭击我主力后路。九月三日我方在胡[扶]山寨、内山寨（新集之西约二三十里）与敌一战，我军占领优胜地形，敌损失极重，将敌人打死三千以上，我军伤亡极少。惜地形不利，不能得取所打死敌人的枪，共缴数百支。是时，南方敌人因我方放弃新集已向北进逼，形成包围新集的形势，同时皖西北敌情紧急，我红四方面军主力共七师（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及第九军之三师）放弃新集，向光山、商城交界之西余集、白雀团[园]沙窝集一边退却，并准备移兵到皖西北去打击皖西北之敌人。这时候，黄麻、光罗、孝感、黄陂一带，只留一些地方武装打游击，就开始了这一带的游击战争时期。红军主力在这里停顿了仅数天，没有打仗，即由总指挥部决定以商城和黄安交界之汤家汇、余子店一带为我军最后阵地，即移动部队以第九军固守余子店阵地，以四军及第七十三师兼程打金家寨，并下令豫东南道委及其他各机关出商城到汤家汇。于是商城一带亦转变成为游击区域。

红军到了皖西，敌人已占领麻埠、独山、诸佛庵一带。这时候，两方兵力对比是：我方在余子店第九军之三师人，外加商城各地方武装，在皖西北有第四军、第二十五军之六师及其他各地方武装；敌人方面，有[在]商城方面有第三、八<十>三、五<十>八之三师人及民团，　余部尚在光山、新集一带，皖西北方面有敌之第四师梁冠英部及第七、十二师之残部，敌之三十三旅在舒城一带。英山已为上官云相部所占。我红军主力停顿于此约十天之久，未有行动。总指挥部认为敌固守工事，且互相连[联]系，无隙可攻，且恐受敌人包围，遂决定退出汤家汇及金家寨，至英山苏区燕子河一带。这时候在燕子河停顿有七八天左右，以大军处万山之中，加以跑反群众数万及伤病号万余人（注：此万余伤病号乃自四次“包剿”以前即在各医院中累积至巨红军集中而来，其中烂脚及病者占大半，至红军在四次“包剿”中作战仅上述三次，每次大胜，伤亡至多一共不过二三千人）[1]，粮食已异常困难，红军及伤病号、群众皆在饥馑状态。当时国焘、昌浩、向前、中生[2]等同志会商的结果是夺回英山，在英山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但一方面粮食问题绝

对无法解决，另一方面除皖西北商城之敌以外，光山一带敌已追踪前来（敌军主力）。当时国焘、昌浩、向前等同志又有向潜、太[3]一带游击之计划，但实际当时敌人之全部计划乃在逼我军向此方向进行（事后<从>敌人报纸上亦知道敌人确有此布置），故由一般同志建议乘虚回黄麻，兼程而行。约十日，前头部队达黄安南部之八里湾一带，由总指挥部决定向河口方面进行。十月十三日在河口与敌人第八十八师及第一师一仗大胜，缴敌械两团多人、<枪>，十五日在罗山南部仙人洞一带有一局部接触，又胜，缴械千余支。我红四方面军自八月十一日至九月三日与敌人接连三次作仗[战]以来，其余时间悉在退却行军中，到此时回黄麻始又作战二次，亦获大胜，一时黄麻群众情绪更为之一振。

其[起]初决定是要以黄麻为根据地，在此击溃残余敌人，而实际上也有此充分条件。因我红四方面军自四次“包剿”以来，虽经作战五次及长次[途]行军，并无大的损失，队伍编制还是足数的，而敌人方面屡次被我军击溃，死亡甚重，加以长途行军追蹑我军之后，士兵生疮生病，逃亡掉队，到他追到黄麻的时候，其主力各师无例外的只剩三四十人[4]。损失最大的第二师每连少则二十人，多则四十人。此外，敌人士气沮丧。而我军主力重回黄麻，士气甚旺，即此兵力之对比，我已占优势，加以在苏区作战，补充甚易，秋收之后粮食丰裕，据我们所俘获的敌军官讲，谓老蒋之一切计划亦在防我红军主力回苏区，知一回苏区即不易对付。但国焘、昌浩诸同志不知何故，人苏区忽中途变计，匆匆将部队从黄麻苏区之一角通过，即人京汉路向西，我红军主力越京汉路而西，敌主力随之俱出，此后传闻红军在随枣[5]一带连给敌人二次打击，将敌之第十师、第八十师完全消灭；又闻我红军在老河口[6]一带后向西北而去，此后约有两个月不闻红军主力的消息，一直到最近打了敌人许多报纸（<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止，申报及其他报），才知道红四方面军在陕西一带。以上是红军与敌人作战及策略之经过情形，以下再讲到苏区的情形。

（二）鄂东北一带苏区，因群众好，故经过情形甚为良好，方[从]红军离苏区东进时，开始布置游击战争，至红军回黄麻（十月十日）时，苏区尚保留有旧有的状态，不过新集、七里坪、黄安县城、宣化店、黄陂站等重要镇市被敌人占据而已。敌人占领这些市镇，农村有游击队的保障还是苏区，敌人非一团以上不敢出发，非两团人不敢走路。农村粮食虽受敌人抢夺，亦还保存大部。至于商城方面（现分赤城、赤南两处），赤城因系新发展之苏区，基础不好，已经丧失；亦南方面尚保留有方圆百里之苏区。皖西北方面，因温玉成同志在红军退往英山时，动摇害怕，把皖西北各区游击队一齐集中出去找红军主力，于是一举而消灭游击战争。后来游击队及留在英山一团红军及英山地方武装在英山集中，由郭述申、刘士奇二同志领导，后因国焘等指示其往潜太行动，又脱离苏区，在潜太一带高山中处处遭受敌人之包围打击，末后才走英山回到赤南，故皖西北的局面甚为不好。但据最近消息，在霍邱白塔畈一带尚保留有一部分的游击战争，目前黄麻、赤南及皖西北交通完全阻隔，不能详言彼方的情形。以下先把黄麻现状、敌人策略与我方策略，比较详细来说一说。

自红军退出新集时，才建立鄂东北道委会。在黄麻一带，省委、省苏等即随红军而来。红军回黄麻，省委、省苏亦回黄麻，即留黄麻领导工作。红四方面军回黄麻时，敌人慌忙退出七里坪、桃花等地，充分表示其慌忙无备。

红军向京汉路西去后，黄麻、光罗一带由于游击战争胜利及武装群众已一共有各种游击队、独立团约万余支枪，加上红军留下在苏区的红军二十五军一团人及二十七军二团人（战斗力差些），又加新近由赤城过来二十七军三团人，实数枪二千支，共计约二万支。敌方在新集有八十九师一师人，宣化店、黄陂站有五十八师一师人，河口有八十师一师人，黄安县城有十三师一师人，麻城、宋埠一带有三十、三十一师二师人，陂孝北有第三师数团人，最近由商城开来<的>光北张金方[钫]七十六师一师人，共约七师人以上，实力不过五师之众。敌人因我方游击队之打击，对于搜索农村十分胆怯。他们采取的战略是利用我红军及游击队之不善攻坚，固守其所据之各镇市，常常会合两路，每路以三五团人出发，到一地即建作工事，将农村粮食、耕牛、猪等尽量搬取及烧毁。每处进攻搜索，则其余各处之军队即固守不出，搜索完了一处，则另搜别一处。对于敌人这种破坏手段，群众深恨，斗争情绪亦异常坚决顽强。凡敌人所到之处群众跑空，凡游击队所到之处群众在万难中供给粮食，不缺供应，且各级党及苏维埃医院等机关费用，亦皆由群众供给，党、红军与群众中间的团结至今依然是很坚固的。只是最初因苏区皆是小的游击队，往往不能给<敌>与[予]有力的打击。罗山、麻南、鄂东北、陂安南等苏区累受破坏，敌人见各区皆已受过打击，遂又进攻黄麻交界一带苏区中心之黄安三区、四区、麻城乘区及光山南区。适皖西北二十七军来鄂东北，我们即把他和二十五军之一团同二十七军之两团合编为一军人为二十五军，共两师即五团人，二十七军即宣告解散。在上月，在编制成功后，适新集八十九师两团人出发到光山南区郭家河，我方集合数团人给与[予]猛烈打击，次日因黄安县城敌人出发，欲重占领七里坪，我方即回师在七里坪东南大古岭一带与之一战，亦与[予]敌以重创。敌虽见我方集中兵力，仍不放弃其计划，遂由新集出兵四团人，黄安县城出兵四团人，麻城、宋埠出兵三旅人，共约十四团之众，来合围我中心苏区。我方因二十五军仅五团，此中心苏区不过三四十里，游击队不过千支枪有零，断难与之力抗，故改变战略，分散游击，打击敌人后方。以七十四师之三团人在麻城苏区东部之福田河及光山东部一带游击，一面抄袭敌人后路，一面打通赤南及麻城、光山之连[联]系；七十五师两团人则在七里坪后面骚动敌人及巩固红安五区、河口、陂孝北、陂安南、罗山等地苏区；中心苏区由游击队牵制敌人，以便群众得余暇退出此区域。此政策实行的结果，红军在各方面打击敌人后路，得了许多胜利，使敌人不得不退却。今则因整个形势开展了顺利的前途，已更进一步的去抓紧与赤南苏区打成一片，及扩大赤南苏区与恢复皖西北苏区的任务。省委临时紧急会议开过以后（十二月三十日开的），省委决定抽七十四、七十五师各一团配合二十五军特务营成立一师人，到赤南苏区去行动。其任务为以赤南为根据地，发展皖西北的游击战争，及尽量派游击部队去英山恢复英山苏区、苏区的游击战争；东南则向赤城及鄂东北发展，扩大苏区打通商光路线；赤南归皖西北范围属皖西北道；豫东南道暂取消；光山划归鄂东北道；鄂东北方面以七十四师（二团人）主要打通商光路线；以七十五师（二团人）巩固鄂东北苏区，同时以孝感、罗山方面之独立第六师立即集中二团人行动，并尽力补充七十四、七十五师，成为每师三团人及马上在红安方面形成有力的一团人，作为再成立一独立师之基础。鄂东北方面依然为二十五军，皖西北则目前就成立二十八军名义，以便扩大成足数一军人。至于行动方面，则一面加紧巩固苏区，保护群众切身利益，一面扩大游击范围，深入对[到]白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去扩大游击区与解决苏区内物质困难。照目前苏区、白区群众情绪及对红军、苏维埃的好关系，深信我们这样的策略，一定可以成功。最近大约因江西中央苏区的胜利进攻及军阀战争更进一步的酝酿，敌人对包围苏区的军队正在调动中，有新的布置。八十师原驻河口现开商城，张金方[钫]之七十五、七十六师原驻商城现移到潢川，陂孝北，河口方面则为第三师、第八十三师之一部。综计在鄂东北方面经此移动，敌人军队实已减少两团人，又据最近敌人行动，则似第三师并不在苏区，而八十三师则为全师。据我们打下敌人的文件，知有“驻剿”与“进剿”之计划，惜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实，大约不外是企图搜集残余兵力以对付中央苏区的条件之下，尽可能的来继续“包剿”我们这个苏区。

敌人方面亦明知消灭黄麻苏区的不易，所以他现在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在破坏农村粮食生产。一方面借此来解决他们队伍给养问题，另一方面是增加苏区群众和游击队伍的物质困难，和到处进攻使群众疲于跑反，久而久之力竭降服。敌人在宣传方面亦注意这一点，他对于群众的改良欺骗，确已自知其没有客观基础，根本上是因为：第一，国民党自己对于他们部队给养的困难，加上运输困难，不能藉对于苏区群众劫掠的方式去维持他们队伍的给养，对于苏区边界群众动摇扯了白旗的场子，国民党军队一来，立即用种种方法勒索群众每家每日一升米供给队伍。百种苛捐杂税同时举行，加以领取良民证、办团防、子弹捐等等，莫非敛办的方法。第二，他不能不让过去由苏区逃亡出去的地主、富农回来，恢复他的土地所有权和向农民勒索稞[课]租，凡边界已向敌人降服的群众，都被富农、地主回来勒收三年的祖稞[课]。所以凡扯了白旗的场子，群众都涕泣想红军回去。遇有我们的游击队去，他们依然供给粮食，态度又怕给敌人知道，又和我们亲热，和看见敌军害怕恐惧的样子完全不同。这种情形在河口、蔡梅两区并光山北部、黄安县城四周一带扯白旗的群众中都是如此。同时凡敌军所扎的场子，原来是白区的地方，对于群众亦取同样的勒索抢劫方式，除开四次“包剿”以前边界有一部分场子，因苏区过去边界工作之恶劣，引起群众仇视的少数场子外，其余赤白界边的白区群众，都是心里比较倾向红军。这真[正]是我们大希望所在，使我们确信我们的斗争一定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

（三）党的工作，现在国焘、昌浩都同着红军离开苏区去了。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委员只有沈泽民同志一个，中央分局的会已开不成功，只有省委，因为有一些主要的干部还在赤区，所以经常能够开会议，领导全盘工作。现在省委各同志都在一种集体领导之下很一致的做工作。组织状况，省委自从泽民[7]、郑位三、成仿吾诸同志回到黄麻后，依然开始工作。省委仍依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不加更动（但因红四方面军的西北行动，有许多不在苏区），常会则以泽民、仿吾[8] 加上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同志、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吴焕先同志等组织之，依然是泽民同志的书记，仿吾宣传部长，组织部缺了，没有方法补充，其他郑位三同志代理省苏人民委员会主席，宝珊[9] 鄂东北道委书记，吴焕先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郭述申（省执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俊[敬] 亭同志（省执委）为光山县委书记参加道委，王平章同志（省执委）为二十五军政委。但最近因黄安县委书记无人，不得已以仿吾同志任之，于是省委两部皆付缺如，只剩泽民一人，同时鄂东北道委亦只宝珊一人，皖西北道委方面只有述申[10]一人。至于县级则更成问题，麻城最近肃反结果，县<委>书<记>尚未想到人。光山自俊[敬] 亭[11]调任七十五

师政委，光山书记亦无人了。各县委大多残缺不全。至于别的方面，省苏只位三[12]一人，鄂东北省苏未成立，省委、省苏俱不是机关，只泽民，位三二人匹马来去，随地驻扎而已。近因焕先[13]已任二十五军军长，宝珊同志吐血患病，位三同志实际上已兼了游击总司令，省苏具其名而无其实。各县苏区情形比较良好，亦有半数残缺。鄂东北方面干部缺乏情形如此，皖西北更甚。我们并不是不注意提拔干部、实以此苏区过去反动活动之发展，自前年九月开始肃反以来，至今仍然不断大批发现，时时整个县委是第三党分子，以致今日干部成为一时极端严重之问题。自去年十<月>间，泽民、仿吾、位三诸同志由皖西北回黄麻以后，即开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十月中旬），彼时以四次“包剿”以来已有两月，许多中心城市被敌人占领，苏区被敌人（受敌人）蹂躏，颇有一部分同志动摇害怕，故主要估计整个政治形势及反“包剿”斗争的前途与党的中心任务及各项具体工作，指出蒋介石之四次“包剿”已站在失败的地位，我方游击战争与红军之胜利及苏维埃政权之巩固（内容请阅决议案）。时以苏<区>红军西去后消息不明，苏区内一部分同志惶惑不安，乃召集一个最高军事干部会议（二十七军来鄂东北时，十一月底），决定以目前形势，红军暂不即回苏区，即依靠苏区目前力量亦可以巩固鄂豫皖苏区，冲破四次“包剿”（未有决议）。最近则因打下敌人许多报纸、文件，乃悉一九三二年世界经济恐慌深入，及全世界全中国反动统治崩溃，与革命运动发展，中央苏区胜利之状况；同时得悉我红四方面军行动到了陕西，乃及中俄复交，乃召集省委临时紧急会议，主要内容请看决议案。对于二十七军的行动及刘士奇同志的错误，亦另有决议由邵达夫同志口头报告。此外，对于红四方面军行动，在会议上有一种深刻的讨论。一致的意见，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的行为，决定一再[面]派人速去找回来，一面报告中央，请中央指示并帮助我们去找，命令他迅速来鄂豫皖苏区。目前有一种最可喜的现象，党内的一般干部和党员的动摇已经减少。最近肃反虽然仍然在不断的发现第三党、 AB团的反动组织，可是这些分子是在四次“包剿”以前加入的，主要的这些人在各处进行与敌人接头，和<从>各方面破坏革命的工作。例如麻城县委书记陈志祖是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加入第三党；罗山县委书记徐术风是一九三〇年加入改组派，去年上半年到罗山又加入第三党的；红安县委书记高方甫，一九三一年在兵工厂加入第三党。以及陂孝北、陂安南，河口等县委书记以及各区委、区苏中许多反革命派，差不多全是一两年前加入的反动组织的老底子。在四次“包剿”起来以后，好相[象]应当更起极大的动摇，但是实际上发现却非常之少，凡一般新起的干部多半是在最近加入共产党，他们对于党的组织系统都不明白，甚至不明白，但斗争十分坚决，很少动摇的。现在这些反动<派>继续破坏，首领分子逮捕，他们手下的那些分子多半在党的号召之下自首了。以后当然不免继续有各种派的发现，但革命环境当能发生很大的影响来提高一般干部的情绪。苏区内至今发现取消派已经不少，这些分子差不多全是从外面来的，如曾郁、陈啸秋、廖仁先、朱郝、龚良炳、朱权平等都已经被捕了，金仁（高晨好，莫斯科学生）在红四方面军退出英山时失散，亦采取消派分子。黎本一亦是取消派，红军退出英山时<失>散，闻被匪军所俘。方英在四次“包剿”前发现他是第三党首领分子，未了才发现他是取消派，他在中央当交通时即加入取消派，因在退出英山时归保卫队押到，已随红军去了，不知如何下落。他在皖西北当道委书记时即与第三党打通一气，后调到赤城更公开活动，凡赤

城第三党都归他指挥。他在各方面破坏军队、土地等一切工作，故意颠倒党的路线和举行有组织的怠工，种种罪恶不胜枚举。又朱光亦是取消派，最近才发现的，现在总指挥部（红四方面军）为政治部的宣传科长。黄超现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先有人说他是第三党，末后又发现他是取消派。最近我们又发现温玉成同志亦是取消派分子，当去年中央来密信，指示中央分局要我们去考查他的问题时，国焘同志即撤销他的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调到皖西北道军区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在这个时期他与黎本一诸人接近，在作仗[战] 中表现很多错误。尤其是关于干部方面，自他作少共中央代表时起直到在皖西北工作为止，凡经过他手提拔的干部，都是后来发现加入反动组织的。在那时候他就施行各方面挑拨离间的手段，首先在分[新] 集挑拔中央分局与省委对立，继而在皖西北挑拨国焘、平章[14]与王建南同志等的相互关系，且有小组织活动的嫌疑，他和黄超有小组织活动的痕迹。末后在红四方面军退到燕子河的时候，他本来在赤南打游击，但是他和黄超二人忽到皖西北去把游击队一齐集中，带之追跟红四方面军。以为红军将南渡长江与中央红军相汇[会] 合，鄂豫皖苏区已经无望了。这一行动使皖西北游击战争完全垮台，今仅有当时未带走的霍邱一小部分游击队仍在白塔畈一带继续出没。因此种种错误，在他回到鄂东北以后，省委批评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定他到下层去作赤卫军工作，希望他转变，不料他的思想仍然异常的右倾，认为第四次“包剿”已经完毕，现在进一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包剿”，认为鄂豫皖苏区的　　党没有领导等。从肃反中廖仁先、梅光荣供他是取消派与方英等同一组织，我们因前后的种种事实（加以中央对他的决议）一齐符合，已将他逮捕了，现在还未开始审讯，大约他在上海时必与罗章龙右派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种种情形，等得研究后再继续报告。此外，还有很痛心的事，就是康永顺同志竟加入了改组派。他在当第十师政委的时候就表现出专弄表笔等腐化行为，后撤职，指定他当红安县指挥部指挥长，他的腐化如故、且右倾消极，专信任一般哗变俘虏过来的白色军官。四次“包剿”起来；他令陂安南县委退出陂安南至红安县去，因恐桃花路线[15]被敌人割断将受包围，因其右倾将他撤销职务，又不承认错误，于是因病人医院至今。他平时与一般有问题分子很密切，有不少人供他加入改组派。因为各方面事实符合，已经逮捕了。

取消派在这一个苏区是一个很小的组织，他们己往的行动，主要是利用第三党、改组派等组织去作工作，他们自己也加入第三党或改组派，而为苏区内第三党之首领分子（当然不能轻视它的前途破坏性）。他们的理论，第三时期依然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反富家政策不正确，应当联合富农，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整个的错了，中国革命高涨现在没有，是国民党稳定时期等等。第三党分子戴继伦讲是方英介绍他加入第三党的，又说是第三派，说苏区内肃反尽是派别斗争云云。则莫斯科中<山>大<学>中之斗争痕迹，今尚明显暴露矣。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竭力找求取消派之下层组织，但所发现者尚极少。因为每一个取消派分子所介绍的多半是加入第三党，直接介绍加入取消派的至今发现的仅寥寥数人。再则这些分子十分之九是从中央派来，全是在上海等地加入取消派，以文化工作者为多。这个问题请中央注意。再柯庆施同志据我们所得的材料，他是改组派分子，与舒传贤、李溪石等在反三中全会，进行破坏党的阴谋。这个亦请中央严重注意。

根据一年半以来肃反的经验，苏区内加入反动派别的人，有一半是中央

分局来此以前加入的。那时因为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富农地主反动分子充满党中，欺骗了不少工农分子。还有一半是中央分局来此开始工作以后加入的。一则因为实行土地法令，大部分差不多全体地主富农分子动摇；二则因党内开始斗争，提拔工农干部、在下级执行中间带有不少反动派分子倾向，而真真在政治路线上之教育工作则处处表现进行的不够，以致肃反开始半年有余，支部中大都不明了第三党为何物，而第三党又欺骗他们说，这是第三国际下面的秘密党，比共产党要好，因此而加入者累累；三则为肃反开始，反动派别加紧活动；而最主要的原因则为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不正确与党的教育工作的薄弱。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国焘同志的工作方式有关系。国焘同志在苏区内开始肃反有很大的功绩，然而在党内领导方式方面，他不采取集体领导的方式，不发动自我批评，不在适当范围内发展党内民主，在组织上差不多全是执行委派，以致许多上级负责同志每参加一次会议，则感觉不能充分发表意见，且开会无许多兴趣。而两条战线斗争之在下级，则恶化的为上级巡视员至下级以审判态度与处罚主义，使多数干部不安于工作，新提拔分子不愿负责，群众中积极分子不愿入党，而第三党、改组派等复利用之，益发将命令方式、处罚主义铺张扬厉，以煽动党员及干部之不满，为反动活动之机会。在肃反中所见，因此种原因而加入反动派别者，竟占所有案件中不下三分之一。此实国焘同志家长制度领导方式的残余之厉阶，由此而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在红四方面军东征胜利的时候，本应当激动全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最好的积极性，而实际恰恰相反，这种领导方式的阻遏党员及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实为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这种倾向，现在正在积极纠正中，在各种会议上自最高领导者起，首先发扬对自身充分之自我批评与竭力接受正确的意见，虽有部分正确和部分不正确的，亦必接受其正确部分而以解释态度批评不正确之一部分。对于下级处处表现不敢发言与发言不知讨论工作与相互批评之现象，则竭力反对过去那种命令与处同主义之残余，多问下级工作的困难所在，引起其讨论的兴趣，加以详细的解答，而引向正确的开会方式与工作积极性。当然，在转变之中，另一方面的危险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之发展。但我们深信在正确的执行两条战线斗争中，当然可以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现在一般党员对于四次“包剿”害怕敌人力量的恐怖，大概已经过去，现在新的危险就是在敌人破坏下的粮食经济困难与干部之极端缺乏状况，所将引起的一部分干部党员与群众的动摇。关于这些问题解决的方针，已经写在省委临时紧急会议的决议中，这里不多说。关于干部问题，自然希望中央帮助我们一部分，以便顺利的推进工作。在我们这方面，则已经采取种种方法来解决目前的困难，这主要在上级励行直接参加与检阅支部工作，并大量的采取民主方式用选举方式以多量提拔干部，并纠正过去详言[16]困难的错误，明言自己困难，号召全党为征复[服]这些困难而斗争，及反对因这些困难而消极动摇，尽量加紧队伍中军事政治教育。对于军事方面，尽量使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参加队伍中党的工作，参加作战，去普遍党的军事教育，并用组织党员后备军（已有相当成绩），组织退伍红色战士协会等等方式去训练与提拔军事干部，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所造成的党内各部工作之废驰（一大原因为肃反后多数干部为加入党才数月之时，对党的工作毫无头绪），如宣传、组织部等于虚设，甚至党与苏维埃之不能分辨，皆从教育中来逐渐克服他们。

苏维埃工作，过去几乎普遍的用委派制度。上级巡视对于下级工作人员

的错误的性质及其原因，不加考查，一发现错误，即以裁判官的方式，实行“改造”，因此新的干部不能养成，苏维埃的威信不能建立，工作日益颓唐。对此现象，现在在极力纠正，多用教育方式来开辟新的有威信的苏维埃工作之前途。此外工会、贫农团，依然勉强可算进行。最薄弱的工作，依然是白区的工作与反帝的运动，这两项工作至今依然是等于没有的，现在用全力来改造特务队的工作，改造边界工作，游击扩大到白区去，改造游击队的工作等等下手。现在首先再来重新布置白区的交通站。至于反帝工作，过去反帝大同盟之开始建立，立即发展了几十万会员，但实际因反帝教育之缺乏，连反帝负责同志都不了解自己的任务同反帝大同盟到底是什么，因此有时成为反动派活动的机会，以至使群众不敢加入。再有的地方误认为反帝大同盟是苏政[17]之一部，这是四次“包剿”前的大概情形；“包剿”起后。反帝同盟的工作有一部分的停顿，今又再加整顿，首先要从教育开始，但目前竟找不出一个忠实可靠的相当文化程度的人宣传这项工作。真是大为难的问题。

（四）现在关于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把我们意见提出来，请中央指示。

敌人初开始四次“包剿”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的一切军事策略，都由国焘同志在总指挥部与昌浩、向前等决定。从未通知后方，甚至泽民同志及省委诸同志，亦多不得预闻，有时通知都在策略决定之后，无从参加意见。等到红军退出新集，再退到商城苏区，再退到金家寨、汤家汇，再退出英山，国焘同志始终拿执行中央指示打运动仗来解释。泽民及目前省委、道委诸同志，亦都不在红四方面军一路，无从知其策略的用意，每[无]数次打电话去询问总方针之决定，亦不肯相告。直到退出金家寨退到燕子河的策略已决定，才找泽民去，则木已成舟。大军已退出金家寨到燕子河一带，彼时国焘同志召集了一个会议，他的意见是南下袭取英山，建立新的根据地，再以此来为阵地，设法恢复整个苏区。后又变计出潜太打游击，这显<然>有抛弃鄂豫皖苏区至少鄂东北根据地的用意，甚至在退出英山后一次中央分局会议上，昌浩同志发言公开的说，亦可相当的巩固苏区根据地的话。终于因为泽民、王平章、甘济时、蔡申熙等的坚决主张红军行动以巩固苏区根据地为原则，及回到黄麻，才决定了回黄麻的政策。然而因红军行动迟疑不决，逗留在燕子河一带已有十天之久，粮尽，敌人四集，始南下绕道回黄麻。那时候红军到了八里湾附近，已在赤区，泽民、位三、仿吾诸同志即往红安找鄂东北道委会，临行时国焘同志犹说，今后红军总不放弃巩固苏区根据地的任务，总在苏区及苏区四周与敌军兜圈子，那时使我们还不料到红四方面军终于脱离苏区的。但是从此一别，红军主力在河口打了一仗，即往京汉路一去不回，直到现在竟远在陕西，且更进一步的向甘肃去了。反动报纸上甚至说，红四方面军甚至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要由内外蒙古大开到苏联去。这个我们认为是反动报纸造谣，不去相信的，但无论如何这红四方面军的整个行动，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主要的负责者应当是国焘、昌浩二同志。追想四次“包剿”以前，省委认为国民党迁都洛阳仅成为偏师，忽视四次“包剿”，这主要是泽民同志的错误。但国焘同志对于决议的这个估计是未加以反对，一般的当时胜利的发狂倾向，乃是普遍的倾向。国焘同志在省委代表大会上报告，估计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师人，其余的都是杂色部队，又说红军有这样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因为战线甚多展开十里，再多军队也展不开了等等，成为普遍的口气，因此对于四次“包剿”

漫不准备，是共得的错误。但“包剿”一开始国焘同志即动摇，以为今来打出一个利害的敌人来了，又说，我们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在红安、光山接连打了三仗，我方皆得大胜利，伤亡不过二千余，即以根据中央指示打运动仗为名，仓惶走出新集，此后一仗未打，以至退到皖西北，退到英山，终是我们的力量只够打一杖不能打第二仗，甚至回到黄麻以后，一见敌人在后追来，即不敢在苏区停留，急急向西行动，过度估计敌人的力量，失败情绪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根源。在这次行动中完×××××××××××××××[18] 巩固苏区根据地的观念，昌浩同志的相当的巩固苏区根据地前面已报×××××××××××××××××[19] 区根据地的这个原则，实际上他不执行，因为他是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会主席，一切都要取决于他的意见。向陕西行动不必说，就在四次“包剿”刚开始时，泽民同志及道委一般同志不约而同的主张把第十师留在敌人后方巩固鄂东北苏区，他认为是分散了兵力，他未同意，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忖之讨论，并且在未退出七里坪以前即把鄂东北游击武装大部分编入红军中，只留下一小部分，现在的游击队都是后来发展的。对于鄂东北道委会及游击总司令部只留下三百元作用费，其余的都归红军。且说红军一退入新集，黄麻即转成游击区。此后由新集而赤城、赤南，由赤南而皖西北，由皖西<北>而英山，由英山而退出苏区，都是这样布置。且其以在英山建立新苏区根据地，逐渐恢复苏区的策略，显然可见他已不把黄麻作为根据地，而且在他看来，黄麻苏区大约已经沦亡，至于黄麻苏区依然是苏区，是他所不能想象的。此外，他这种观点不是从现在起，国焘同志在初进苏区时，因正进行第二次“包剿”，他把红军拖向北走，即令红安独立团退数十里，谓宁可丧失数十里苏区，不能令红军受到损失。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上，他说苏区如果没有粮食不过成为一片荒土而已等等观点，他忽视苏区根据地是一贯的错误。至于红四方面军丢下几团人在苏区，那是因为这些部队比较战斗力弱，障碍红军主力迅速行动，而且在英山并留下两团，回黄麻已[以] 后并留下两团，留下这四团不是主力的部队，主要的原因是替主力打掩护的。现在虽然由于努力游击战争的结果，苏区已经有了相当的巩固。人人自信即使红四方面军不回来亦可巩固这块苏区。然这决不是说，如果红四<方面>军没有脱离就不能扩大我们的胜利。实际的情形，当红四方面军一路由新集<退>向皖西北时，中间未必无一打仗之机会。再红军回到黄麻时，秋收正熟，敌人退出桃花、七里坪，未始没有阵地。敌人远道追来，队伍拖垮大半，那时依靠苏区群众的掩护、游击战争的配合，一定可以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即使不然，与其在终南山和敌人兜圈，倒不如在苏区及苏区四周和敌人兜圈子多兜几个，看敌军不要兜垮了。真真的，那时如有坚决的斗争，四次“包剿”不得到这个样子（对于鄂豫皖苏区不得到这样子），现在虽然依然在逐渐巩固起这块苏区来，但是饱受敌人的蹂躏，疮痍满目，民众生活无柴乏米，痛苦难堪，这都是主力离开苏区的原故。红军主力北上始在桐柏，我们以为他在恢复鄂豫边的苏区，继在终南山，我们以为他在造北方的新苏区。现在反动报纸又说，他往甘肃前进，这就不知他什么目的了。反动报纸载这些行动，并不见得凭空造谣，难道他们真如反动报纸所说的打通国际路线去了吗？而且红军主力六团之众。拖这几千里白区中过，即算战争不受损失，沿途疾病吊[掉]队也要受很大的损失，何况沿途作战。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有其他特殊原因，但我们决不相信是根据中央指示来作的。我们看来，这种行动是违背了国际指示、中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